

“五伦”说:构建和谐社会应当汲纳的历史资源

冯 天 瑜

[摘 要] 长期以来,无论扬谕还是贬斥,“五伦”说与“三纲”说都被并列论之。其实,“五伦”说与“三纲”说分别代表了中国伦常观念的两种不同传统,应予分梳。“五伦”说昭示的人际间双向互济关系,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有益的借鉴。

[关键词] 五伦;三纲;和谐

[中图分类号] G0 [文献标识码] A [文章编号] 1671-881X(2008)02-0209-04

保持民主与权威之间的适度张力,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关键之一,这既是一个政治问题,也是一个伦理问题。中华文化为解决此一难题提供了有益的资源,这集中体现在“五伦”^①(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兄弟、朋友)说所昭示的人际间良性双向互济关系的理念。

自两汉以来,人们习惯于将“三纲”说与“五伦”说并列论之(所谓“三纲五常”、“纲常名教”),无论是汉至清对“纲常名教”的推崇,还是近代将其在“旧礼教”名下加以抛弃,都是把“三纲”说与“五伦”说捆绑在一起的。其实,“三纲”说与“五伦”说虽然都是宗法制度的产物、宗法观念的表现,有着相通性,但二者又颇相差异,分别代表了中国伦常观念的两种不同的传统,不宜笼统处置,而应当予以分梳,区别对待。

—

近 20 年来,“可持续发展”已然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,这首先集中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,诸如能源问题、环境问题凸现为紧迫课目。然而,人类要真正实现“可持续发展”,除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外,还必须追寻人与自我、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,求得人际关系的健全发展。而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互动共济的人伦理念值得借重,这种理念集中体现在“五伦”说之中。

人称中华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,指的便是中华文化着力于探讨尊卑、男女、长幼等人伦关系,有单向独断论和双向协调论两说,形成两种传统。

一种传统,表现为“三纲”说,所谓“君为臣纲,父为子纲,夫为妻纲”,认定尊者、长者拥有绝对权威和支配地位,卑者、幼者唯有屈从的义务。这种单向独断论的绝对主义伦理观念构成专制政治的伦理基础,是长期桎梏民众的精神枷锁。

另一种传统,表现为“五伦”说,所谓“父子有亲,君臣有义,夫妇有别,长幼有序,朋友有信”,其间包含着人际间的温情、理解和信任,而且是相对性、双向性的要求,追求人际间的和谐共处,体现了阴阳彼此依存、相互为用的中国哲理灵魂,昭显了“仁者爱人”、“交相利,兼相爱”的中华元典精义。

以君臣一伦而言,“五伦”说对君与臣两方面都提出要求,《孟子·离娄下》说:君之视臣如手足,则臣视君如腹心;君之视臣如犬马,则臣视君如国人;君之视臣如土芥,则臣视君如寇仇。孟子反复劝导国君“保民而王”,荀子则有“君者舟也,庶人者水也。水则载舟,水则覆舟”的警告,八百载后唐太宗与魏征君臣对中的“水可载舟,亦可覆舟”的名论承袭于此。至于夫妇一伦,“五伦说”则以“义”为标准,“夫妇

以义事,义绝而离之”。“夫不义,则妇不顺矣”。这里强调的也是一种双向性要求。在父子一伦上,主张“父慈子孝”;在兄弟关系上,主张“兄友弟恭”,也是双向要求;朋友关系则讲究互利互助,“交友之旨无他,彼有善长于我,则我效之;我有善长于彼,则我教之。是学即教,教即学,互相资矣”,倡导朋友间互相取长补短,推崇的仍然是双向互济关系。

梁启超慧眼卓识,将“五伦”的精义称之为“相人偶”,也即人际间对偶关系的相敬互助。

这种对人际间在权利与义务两方面提出双向互助性要求,以形成较为和谐的人伦关系,在利益驱动的现代社会的尤其显得宝贵与急需。东亚国家、地区在20世纪下半叶创造经济奇迹,除利用最新科技成就,借用西方市场经济的竞争与激励机制以外,一个重要原因是东亚伦理的人际和谐精神得到现代式发挥,将企业和社会组合成风险共担、利益均沾的“命运共同体”,使管理者与劳作者在“和”的精神凝聚之下,形成长久、牢固的“合力”,而不是短暂的利用关系。这正是对东亚和合精义的创造性发挥,暗合了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的名论——天时不如地利,地利不如人和,也暗合了《荀子·王霸》的名论——上不失天时,下不失地利,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。与佛教的“丛林共住精神”也彼此契合——在管理架构上“各守其份,各尽其职”;在生活上,以众靠众,实践互敬互勉、无诤共住的和合僧团精神,共同遵守“六和敬”——身和同住,口和无诤,意和同悦,戒和同修,利和同均,见和同解。此皆为可久可大之道。

二

“三纲”说与“五伦”说的生成机制有性质之差,成说时代有先后之别。大体言之,“五伦”说形成于先秦,是宗法封建时代(本义上的“封建”,而非泛化的“封建”)的产物,较多地保留了氏族民主遗存、蕴蓄着血亲温情,讲究的是“情理”;“三纲”说(君为臣纲,父为子纲,夫为妇纲)酝酿于战国,形成于秦汉,是宗法专制时代的产物,体现了君主专制覆盖下的垂直式独断,强调的是上对下的等级式威权以及下对上无条件服从。

人类在跨入阶级社会之前,经历了漫长的无阶级的氏族社会,其间孕育了氏族内部以血缘纽带维系的原始民主,在跨入阶级社会初期,如中国的商周时代建立的宗法封建社会,还保留着若干原始民主的痕迹,并在两周历史条件下演化为“民本”说与“五伦”说。而“三纲”说定形于秦汉以降的专制君主制时代,其强势的独断论为专制帝王和其他尊者、长者所喜好、所运用,虽然受到历代民本主义者和异端思想家的批判,然其主流地位从未动摇。时至近代,“三纲”说的元典性成为保守与革新两大派别争论的焦点。

张之洞在《劝学篇》内篇的《明纲》中亟言三纲说来源于圣人之道。近代启蒙思想家则以“三纲说”为扬弃对象,如何启、胡礼垣在《劝学篇书后》中指出三纲说有悖于人道,认为君臣、父子、夫妇之间应是平等关系,只应服从情理,不应以绝对的垂直纲纪加以强力控制。何启、胡礼垣特别揭示三纲说的非原典性:三纲之说非孔孟之言也。三纲之说,出于《礼纬》,而《白虎通》引之,董子释之,马融集之,朱子述之,皆非也。夫《礼纬》之书,多资讖纬。以讖纬解经,无一不是,为其无实理之可凭也。三纲者,不通之论也。

何启、胡礼垣在批评“三纲”说的同时,又陈述“五伦”说的合理性,称其“通明”“不偏”,保存了血亲和谐的双向互动理念。又进而指出,“五常之道,在孔子二千余年之前而已然”,即源自上古;同时,“凡尚理学如希腊等国,亦莫不以五伦为重”,足见五伦说是古今中外之通义。

综上所述,古人、近人都不乏对“三纲”说与“五伦”说加以分梳的努力,我们今日更应超越混淆二者的粗率思维,在扬弃“三纲”说的同时,用力开掘“五伦”说的宝贵精神资源,借以发挥其社会协调功能。

“五伦”说尚未构成对专制主义政治伦理的直接抗拒,但它阐发的是对尊与卑、上与下的双向要求,具有协和性。所谓“君使臣以礼,臣事君以忠”。分别对君和臣提出要求,“君礼”与“臣忠”方能达成君臣和谐,同舟共济。所谓“父子有亲,君臣有义,夫妇有别,长幼有序,朋友有信”。为五伦关系分别树立了“亲、义、别、序、信”等富于理性和人情的准则,并无绝对主义的要求。成书秦汉之际的《礼记》《礼运》篇,对先秦的五伦说作了总结,将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长幼、君臣这五组社会人际关系的良性双向互动概括为:

父慈子孝 兄友弟恭 君明臣忠 夫和妇顺 朋友有信

“五伦”说主要强调上下关系的协调,而“各守职分”(处在五伦关系诸层级的人各有责守,必须各尽义务)是达成和谐关系的要义所在。唐玄宗时人李华撰《中书堂政事记》,提出君、臣各有四“不可以”:君不可以枉道于天,反道于地,覆道于社稷,无道于黎元。臣不可以悖道于君,逆道于仁,黷道于货,乱道于刑。

值得注意的是,这里肯定了宰相主持的政事堂有监督君主的权力,认为君主必须善待黎民百姓(“黎元”为“黎民”之变称,“元”是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讳),方为“有道”。

总之,“五伦”说讲究的是上下各守职分,各尽义务。这一思路包含了“互动”与“双向要求”的合理因素,既是对专制独断论的一种抑制,也是对无政府及民粹倾向的一种防范,有助于我们今日正确处理社会人际关系,特别是政府与民众关系、劳资关系、家庭关系、医患关系、民族关系、国际关系,以构建和谐社会。

以政府与民众关系(或称官民关系、干群关系)为例,片面的单向要求,或者出现上对下的“专断”,或者出现下对上的“民粹”,都将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,陷入不和谐困境。再以劳资关系为例,资方如果一味追逐利润最大化,置劳方利益于不顾,反之,劳方如果以破坏生产力的方式反抗,都将激化劳资矛盾,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。三以民族关系为例,大民族的威压主义和小民族的分裂主义,都不利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繁荣昌盛、谐和发展。环顾全社会诸种双边关系,五伦说阐扬的“良性互动”与“双向要求”颇富启示意义,可以防患于未然。

当然,传统的“五伦”说作为宗法等级社会的产物,侧重强调“义务”,尤其是下对上的义务,而基本没有涉及“权利”问题,没有对民众享受权利和运用权利(所谓“民享”与“民治”)给予肯认,故中国传统社会不可能充分实现社会和谐,秦以下专制皇权社会两千余年间,社会动乱此伏彼起,便是明证。社会主义的精义便在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、实现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。我们创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时,应继承前人的优秀遗产,如“五伦”说在义务问题上的良性双向互动观;同时也要超越前人,有所创发,如在义务与权利的统一上,实现上下层级的良性双向互动,这可能是我们的社会长治久安,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之一。

三、展示和谐精神的佳妙文化符号

“五伦”说的核心理念是“和谐”,而国学中对于“和谐”精义最简明、直观的表现便是太极图阴阳鱼(见图1)。



图1 太极图阴阳鱼

这一图式生动形象地揭示了宇宙构成的奥秘:阴阳对立而又统一,相应而又合抱。太极图中的S曲线,是一分为二的阴阳双方彼此依存、制约、消长、转化的动态展现。由此曲线判分的阴阳双方,互补共生,相反而又相成,象征着宇宙万象遵循对立统一法则实现的和谐。在阴阳鱼周围绘出伏羲八卦图,合称“伏羲太极图”,展示“易有太极,是生两仪,两仪生四象,四象生八卦”图像,将易道的“流行”与“对待”两大精义生动揭示出来。太极图形象而集中地体现了多元综合性、互补和谐性、动态演化性。这种特性

体现于天人之际,便是人类与自然相亲和,“赞天地之化育”“与天地参”,达到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共生。表现于人世间,便是“琴瑟调和”的五伦良性互动共济。

人类诸文明创制了多种文化符号,这些符号都各有深意,然就昭显和谐精神而论,皆无出于太极图阴阳鱼者。

阴阳互补共生、相反而又相成的观念,是克服主客两分对立的现代病的启示之源。美国当代物理学家弗里乔夫·卡普拉(Fritjof Capra, 1938—)对此有生动的论说。他批评笛卡儿、牛顿代表的工业文明的机械论潮流,主张从中国关于“道”的观念和阴阳互补思想吸取营养,建立有机的生态智慧。他认为,文化观念中包含阴、阳两种因素,女性、收缩、保守、响应、合作、直觉、综合可归于“阴”;男性、扩张、要求、进攻、竞争、理性、分析可归于“阳”。西方智慧主导的现代工业文明的失衡,主要表现为阳盛阴衰,“过分强调了阳——理性知识、分析、扩张;忽视了阴——直觉知识、综合和生态意识”。西方文化是一种“阳性文化”、“崇阳文化”,并已发展到“至阳”。根据“阳至而阴,阴至而阳”的原则,它正面临“阳至而阴”的转折。在这一转化过程中,东亚智慧的启迪至关紧要,因为东亚智慧包含着丰富的阴性因素,并在一定程度体现着阴阳平衡。而“五伦”说正是人伦关系阴阳平衡的辉煌展现,为我们创建和谐社会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。

注 释:

① 文中关于“五常”的内容皆引自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,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,《荀子·王制》。

(责任编辑 桂 莉)

Doctrine of Five Cardinal Relationships: One of Historical Resources Derived for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Society

Feng Tianyu

(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Research Center, Wuhan University, Wuhan 430072, Hubei, China)

Abstract: Ether applause or discrimination, the doctrine of “Five Cardinal Relationships” and the doctrine of “Three Cardinal Guides” had been mentioned in the same breath for a long period. In fact, they represented two different tradition of Chinese moral obligation concept which should be distinguished. The two-way interlinked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s which the doctrine of “Five Cardinal Guides” proclaimed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society.

Key words: five cardinal relationships; three cardinal guides; harmony